

翻译学跨学科研究之路径

穆雷 杨扬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要:本文立足翻译学的跨学科属性,回顾当下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并以生态翻译学为例,从“为何跨”“何能跨”“如何跨”以及“跨为何”四个方面阐述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基本路径和具体要求,包括:(1)立足研究起点(问题导向性、学科本体性);(2)明确交融前提(内在关联性、对象适切性);(3)寻求贯通机制(关系明晰性、知识创新性);(4)追问研究价值(目标针对性、现实关照性)。

关键词: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生态翻译学;路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0)06-0118-08

0 引言

翻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中的一个“后起之秀”,翻译现象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翻译研究亦可借鉴使用不同学科的一些通用研究方法,因此翻译学被认为是具备跨学科性质的综合性学科。跨学科研究基于不同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学科之间理论视角、术语概念、研究方法等的借鉴、渗透、交叉和融合,从而拓宽视角,深化认识,更新结论。随着翻译学的学科建设讨论日益深入,不少学者借用其他学科的术语概念,试图进行跨学科译学话语体系建构。据方梦之(2017)统计,当前已有70余种译学总论或分论系列论著。这些总论或分论大多是翻译学跨学科研究成果,读者评论则既有支持,也有批评。

跨学科研究是否可以其他一切学科的理论、概念、方法等照单全收呢?显然不是。倘若如此,翻译学就失去了其独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就失去了独立学科存在的意义。虽然翻译现象的跨领域性决定跨学科翻译研究的必要性,但“跨”的领域和方式方法并非毫无限度。跨学科研究应该考虑学科之间为何要融合、何以能融合、如何融合、融合的价值何在等问题,遵循一定的路径与方法。本文以当前国内翻译学跨学科研究成果之一的生态翻译学为例,反思当下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为翻译学跨学科研究提供路径启示。

1 翻译学跨学科研究之现状

跨学科研究是指超越一个学科边界,涉及两个及以上的学科知识领域的研究活动。它从某单一学科无法应对的综合性、复杂性的研究问题出发,基于学科间的内在关联,通过不同学科的交叉互动,实现对问题的跨域整合研究,进而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交融。与跨学科研究相关的概念包括多学科研究(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复合学科研究(pluridisciplinary studies)、交叉学科研究(cross-disciplinary studies)或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超学科研究(transdisciplinary studies)等。这些概念都涉及两个及以上

收稿日期:2020-05-10

基金项目: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重点项目“翻译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2019GD0021A)、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基于CSE典型口译活动量表的口译教学形成性评价模式研究”(20GWCXXM-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穆雷,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翻译教育和语言服务研究。

杨扬,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学博士生,主要从事翻译教育研究。

的学科,其研究理念和路径都在于突破学科疆界,只是在是否整合以及如何整合学科知识方面略有差异,因此,广义上这几个概念都可以纳入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唐磊,2011)。

蓝红军(2019)对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进行了界定,认为它是指在研究具体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时吸收、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拓宽思路,深化理解,促进翻译阐释的深入发展。他将跨学科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即为学科自身的研究、为新学科的研究和为横断学科的研究。他同时指出,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属于第一层次,是以发展翻译学自身为目的而与其他学科交流的研究。由此他界定了当下翻译学跨学科的本位与越位,明确了其研究的自主性立场。随着翻译领域跨学科研究的逐步深入,不少研究成果相继涌现。当前国内基本上形成了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哲学思维系统(如翻译哲学、翻译思维学等)、社会文化系统(如文化翻译学、社会翻译学等)以及语言符号系统(如翻译修辞学、翻译符号学等)的研究路线图(吴文梅,2020)。

在这些丰富成果的背后,不少学者看到了翻译学跨学科研究所暴露的一些问题,如译学本体边缘化,简单套用和强行关联,片面追求“大体系”,论证逻辑缺乏,知识创新不足,应用价值不够等。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在跨学科翻译研究的原则、途径和方法等方面提供了诸多建议。韩子满(2018)分析了跨学科的表现和成因,澄清了它对翻译研究的贡献和风险,提出了跨学科翻译研究的四个意识:解决问题的意识、翻译为本的意识、选择与创新的意识以及方法论意识。蓝红军(2019)在李运兴(1999)所提的跨学科移植的三原则(相关性、层次性和适存性)的基础上提出三点补充原则:问题导向原则、对象适切原则和动态综合原则。

经过不断批判反思,我国的翻译学跨学科研究在定位、原则、途径、方法等理论层面日渐清晰,相关跨学科研究实践也日益增多。以生态翻译学为例,作为生态学和翻译学跨学科研究产物,经历“立论、倡学、创派”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的理论话语系统(胡庚申,2013)。然而,当前译学界对生态翻译学的基本问题存在一定争议,一方面显示了译界学人对生态翻译学相关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下翻译学跨学科研究还存在一定值得探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个案,探究其争议焦点,管窥当下翻译学跨学科研究之实况,为我国翻译学跨学科研究提供相关启示。

对生态翻译学的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前提、建构方式、核心概念、重要理论、体系命名、研究价值等方面。其中,研究前提主要针对关联序链在阐明翻译活动与自然活动内在联系的解释力上进行争论;建构方式主要围绕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同构隐喻进行讨论;核心概念主要集中在“生态翻译”“翻译生态”“翻译生态环境”等辨析上;重要理论则主要围绕“译者中心论”和“适应选择论”相关内容进行广泛深入探讨;体系命名主要围绕“翻译生态学”和“生态翻译学”进行辨析;研究价值则聚焦于生态翻译学“喻指”和“实指”取向的价值问题。对生态翻译学的诸多争论从根本上体现了学者们对生态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方面的认识分歧,具体关乎生态翻译学的跨学科缘起、成为可能的前提、研究定位和内容、研究价值和意义等,体现了学者们对跨学科研究“为何跨”“何能跨”“如何跨”以及“跨为何”的根本追问。因此,对当下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反思可从这四个层面进行分析讨论。

2 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前人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尝试提出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基本路径要求,具体包括(1)立足研究起点——问题导向性和学科本体性;(2)明确交融前提——内在关联性和对象适切性;(3)寻求贯通机制——关系明晰性和知识创新性;(4)追问研究价值——目标针对性和现实关照性,分别回答翻译学跨学科研究“为何跨”“何能跨”“如何跨”和“跨为何”四个问题。

2.1 立足研究起点

一个学科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成立,首先应出于对认识和解决学科相关问题的需要,问题导向性是

首要原则。问题的性质往往影响理论体系的本体定位、建构方式和具体内容。因此,跨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起点是明确研究问题,也即明确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其次,定位问题需要基于本学科的自主性立场,注重学科本体性。坚守学科本体性并非要固化学科边界,而是要尊重学科的基础作用,重视学科纵深发展的根基是否稳固。一方面,问题的研究是社会的需要,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和价值所在;另一方面,学科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学科的系统性和稳定性,不能舍弃学科的研究;二者应相互结合,通过问题的研究来扩大和推进学科的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路径(顾海良,2010)。基于以上分析,跨学科研究的起点要注重问题导向性和学科本体性,回答“为何跨”的问题。

2.1.1 问题导向性

理论若自下而上去建构,一般是发现具体问题,归纳总结,聚沙成塔,逐渐构成理论体系;若自上而下去建构,则可以在假设的基础上形成框架再进行理论演绎,用证实或证伪的方式进行验证和修订,使其逐渐逼近真理。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理论发展,都必须明确所针对的研究问题,避免大而空洞言说。

关于生态翻译学建构的前提性问题域,胡庚申在不同时期作过相应阐释,大致可以概括为:翻译学研究因缺少“龙头”学科难以达到全局整合(胡庚申,2009);翻译学需进一步丰富翻译研究的理论话语和表达方式(胡庚申,2013);文化转向后翻译理论解释存在局限,翻译学面临“范式危机”,学科需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东西方译论失衡,译论忽视译者主体性,等等(胡庚申,2019)。可见生态翻译学面向的问题包括了学科内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理论发展等多个方面,更多集中在翻译学理论问题层面,基于对翻译研究整体的批判反思进行理论建构。蓝红军(2018a)对翻译学面向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作了详尽阐述,认为表面上翻译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与形态,但从根本上来说,翻译理论的研究问题多来自实践,是由个体化的实践问题向具有普遍性的认知问题提升而来的;并不意味着进入学科体系发展阶段之后,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因形而上思辨的需要而远离实践。因此,生态翻译学可以在目前论述的理论问题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其背后的实践根源,以便更好地凸显理论价值。除此之外,要明确生态翻译学所涉及的不同问题域背后的统一逻辑和核心焦点,并将其作为探究的重点,因为某个理论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应结合实践来明确其问题指向。

2.1.2 学科本体性

对生态翻译学的学科本体性考察主要基于其和翻译学的关系上,即生态翻译学在学科版图中的定位与作用。针对生态翻译学和翻译学的关系,胡庚申(2013)解释道: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主体还是翻译学的问题,其定位是以生态学为综观视角的翻译学研究,运用生态理性来研究翻译,丰富翻译研究,发展翻译学;生态翻译学不会也不可能替代翻译学。因此,生态翻译学所阐明的学科本体性是较为清楚的,是以发展翻译学自身为目的而和生态学交叉融合的研究。

针对生态翻译学的具体性质定位,胡庚申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阐述略有不同,包括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翻译理论形态(胡庚申,2008)、普通翻译学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胡庚申,2013)、宏观生态理性视域下纯翻译学与应用翻译学研究的总和(罗迪江等,2017)、系统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胡庚申,2013,2017,2019)、翻译研究的方法论(胡庚申,2013)、翻译研究范式(胡庚申,2014,2019)等。由此可见,生态翻译学对自身的性质定位是在不断调整的,目前的定位是一个具备“范式特征”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

基于库恩(Kuhn,1970)对范式的阐述,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中具备范式特征的理论体系至少应体现三个特点:革命性、整体性和共识性。革命性是指该理论体系对原有理论的视角、立场、原则、方法等的结构性突破;整体性是指理论体系所体现的宏观指导原则和总体视界;共识性是指科学共同体对该理论体系广泛认同,不再纠结于对体系概念的泛泛争论,而是转向具体问题的解决。从这个角度看,当下生态翻译学是否可称为一种“研究范式”还值得商榷。除此之外,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包括清晰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且跨学科研究要以知识生产为目标,创新本学科的理论体系,推动学科知识向纵向分化与横向融合发展(王晓玲等,2020)。因此,

生态翻译学的自身定位应考虑其在翻译学知识生产与创新上的作为。若为研究范式,它在哪些方面可以对原先的翻译标准、原则或理念等实现根本革新?作为系统的理论话语体系,它在关注新的研究对象、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创立新的概念体系等方面是否会补充和完善学科现有知识?若这些问题没有提前考虑清楚,可能会造成其在学科中的实质定位模糊,影响其建构价值。

2.2 明确交融前提

以问题导向性和学科本体性为研究起点,跨学科研究还要明确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融合对象的适切性,这是不同学科能够进行交融的前提。关联性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可归纳为两事物或多事物之间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属性的关系状态。对于理论建构而言,要在明确对象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共通性,重点在于严谨地论证其内在关联。在适切性方面,跨学科研究对概念、理论、方法等的借鉴不能仅流于表面,要充分考察所借鉴对象的思想源头和生成语境,作出优化选择。对学科间的内在关联性和对象适切性进行充分论证,才能回答跨学科研究“何能跨”的问题。

2.2.1 内在关联性

对于翻译学与生态学之间的关联,胡庚申(2010)尝试通过“关联序链”理论图示从“翻译”到“自然界”的内在逻辑链条,认为翻译是一种人类行为,与自然界的活动总体上是关联和相通的,且基于多层次多方位的类比与推论,从而找出规律并形成理论。关于类比推理,赵佳花(2018)做了细致分类,认为当以类比推理的源域和目标域的“域”的约束条件为依据时(“域”是指领域、范围、范畴,包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可将类比推理分为同域类比和异域类比;同域类比是指源域和目标域的对象属于同类或相近类别,并具有相关相似性;异域类比是指源域和目标域对象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别,对象的元素和属性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关相似性,但元素和属性本身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别,包括比喻、隐喻等相关说理形式,而比喻和隐喻由于缺乏清晰的论证图式和准确的类比关系,会削弱对结论的支持力度。

一方面,“关联序链”意在展现翻译活动与自然生态的互联关系,从逻辑上将翻译活动与自然生态置于同域的关系,为翻译学与生态学的交叉融合提供理据;另一方面,胡庚申(2008)又指出生态翻译学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进行整体性研究,并且通过对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综观考察,可知实质上胡庚申更多是从隐喻层面论证翻译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联,这就在逻辑上将翻译活动和自然界置于异域关系,一定程度动摇了“关联序链”论证的有效性,使翻译相关“生态”都纳入了“喻指”含义,这又和生态翻译学“喻指”和“实指”研究并举的指向有所冲突。

有学者指出,在西方逻辑下考量生态翻译学理论建构大厦的“关联序链”是欠全面的,但是在东方类推逻辑下是可行的(张小丽,2017)。笔者认为,作为一个追求融通中外的系统理论,生态翻译学可以在理论体系所蕴含的理念、思维、方法、内容等方面融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色,但若在理论建构的学理性及内部论证方面缺乏西方逻辑的严谨性,可能会影响其理论的国际认可和接受。正如蓝红军、许钧(2018)所强调,要实现话语的融通性和国际影响力,新创的话语(及其体系)需有充分的学理性、原创的思想性和良好的可传播性;其中,学理性体现为概念、范畴和命题等基本话语要素所构成的逻辑严密的体系要具有抽象、理性、论理的特征,可传播性则体现为新建话语须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和接受,具有国际通约性。

2.2.2 对象适切性

生态翻译学坚持“中西合璧”“古今贯通”“文理交汇”的学术追求(胡庚申,2013),顺应了我国译学话语体系从借鉴西方、创新本土到融通中外的建设方向。然而,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差异、古今社会现实的差异、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差异,都会让“贯中西、通古今、汇文理”的跨学科理论建构在对象适切性上面临多个方面与不同程度的困难。

比如,生态翻译学力图融合“共生共存、整体主义的西方生态哲学”和“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东方生态智慧”,体现其“中西合璧”的学术追求。生态哲学是当代哲学界从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进程,面向生态环境危机的严峻现实,展望人类生存发展的文明前景等一系列活动中提炼出来的哲学新形态(包

庆德,2004)。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是多层次、多方位的,落脚点是人道,核心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and 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以及人的行为准则和精神生活的终极根源,其中涉及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是以政治、伦理和精神境界为本位的,因而,“天人合一”的核心不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刘立夫,2007)。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的内涵层面,东方生态智慧与西方生态哲学思想是有差异的,要更好地融合二者,应该追溯各自的思想渊源,在明确差异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取舍化解或创造性转化,遵循对象适切性,更好地实现体系内部一脉相通。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环境问题与现代世界性的环境生态危机性质大不相同;在环境问题尚未危及人类生存的传统社会,中国的环境保护思想主要停留在儒家的仁爱理想的层面,而道家的“自然主义”更是境界性的,充满着理想色彩(刘立夫,2007),且古汉语中的“自然”(如“道法自然”)和如今的“自然”含义也相去甚远。因此,在选取理论资源时,也要考虑理论生发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现实,从古今对比层面考虑对象的适切性问题。

在“汇文理”方面,要考虑到自然科学的理论法则不一定适用于人文社会学科领域。比如胡庚申(2013:166-167)认为“语文学范式的‘文本系统’和‘翻译自身系统’由于忽略翻译现象关联的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同样不能够满足翻译研究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因而也应验了‘适者生存’和‘汰弱留强’的基本法则,逐渐被淘汰和替代”。这种说法有失准确,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一现象背后往往涉及诸多复杂因素,很多关系运作机制并非自然科学的原理法则可以解释。翻译研究虽然历经几次范式演进,但原来的范式并非被淘汰和替代,而是和新的范式共存,在特定研究领域和问题上仍发挥着价值。综上,如何实现“贯中西、通古今、汇文理”,又符合当下翻译的实际,是生态翻译学可以进一步深入探究的话题。

2.3 寻求贯通机制

跨学科研究根据视角的不同可概括为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与文化交融四个层次(刘啸霆,2006)。翻译学跨学科研究要明确翻译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具体贯通机制,到底是贯通方法、贯通理论或者贯通问题,还是几者兼有?明确的贯通机制表现为对两个学科明晰的关系定位。其次,跨学科理论体系应该减少空泛讨论,着重明确之论,不能仅停留于对概念理论的机械套用或移植,应在追求学科知识创新的目标下寻求贯通方式。学科之间的关系明晰性和贯通方式的知识创新性体现了对跨学科研究“如何跨”的要求。

2.3.1 关系明晰性

生态翻译学体系内部有关生态学和翻译学关系的阐述,主要是借助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同构隐喻和概念类比,重在“喻指”(胡庚申,2013),即生态学和翻译学是隐喻类比的关系,理论体系也以“喻指”研究为主。虽然胡庚申(2008)提出生态翻译学研究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其中“喻指”是指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实指”是指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但是,陈月红(2016)指出,上述的“实指”和“喻指”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张小丽(2017)也认为,生态翻译学从立论、倡学到创派都偏重推类路径下的喻指研究,即借用生态学理念阐释翻译本体。随着生态翻译学的发展,胡庚申在“实指”和“喻指”问题上也不断进行调整,目前以“喻指”和“实指”研究并举,其中“实指”研究既包括翻译自然生态作品和研究绿色翻译行为,也包括揭示作者、展现译者的生态思想和发掘文本生态意义,还包括促进人文生态发展,为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提供语言翻译服务,以及贯通生态翻译与生态语言、生态文学、生态文化、生态批评等“他者”生态学意义上的相关研究等(胡庚申,2019)。

生态翻译学之所以在“喻指”和“实指”问题上引发争议,且相关阐释不断被调整,主要原因是胡庚申对其理论体系内部“生态”一词的界定并不明晰。胡庚申(2013)虽然指出生态翻译学的一些术语是对生态学概念的借鉴或“借用”、参照或“类比”,并列作为生态学术语的“生态”一词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但其对生态翻译学语境下的“生态”含义并未作明确说明,而是时而采取原始含义,时而采用隐喻含义,视作者需求而定,且没有在含义转换时作详细的解释和辨析。“生

态”的原始含义仅限于自然环境,但随着生态理论不断发展,逐渐隐喻至人文社会的范围,常泛指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也致使很多生态学交叉学科形成非隐喻研究(实指)和隐喻研究(喻指)两种模式。但对于多数生态学跨学科研究,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从不同学科侧面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对生态危机进行综合回应,探寻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重在“实指”层面的研究。比如生态批评作为当代生态思潮和文学研究的结合,通过研究文学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建构生态型文学体系,从而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型人类文化(胡志红,2005)。

生态翻译学作为生态学与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产物,应该在建构时就明确理论体系“喻指”和/或“实指”定位,并对相关概念分别作不同层面的针对性解释。“实指”研究和“喻指”遵循不同的建构路径,对理论的贡献各有侧重,若不作必要说明,会导致理论体系内部逻辑不连贯、概念不清晰、论述前后矛盾以及限制应用研究良性开展等问题。结合生态翻译学前期研究以及上述分析,笔者尝试对生态翻译学的“喻指”和“实指”研究进行跨学科路径定位(图1),进一步明示其“喻指”“实指”研究的发生机制以及对理论体系的不同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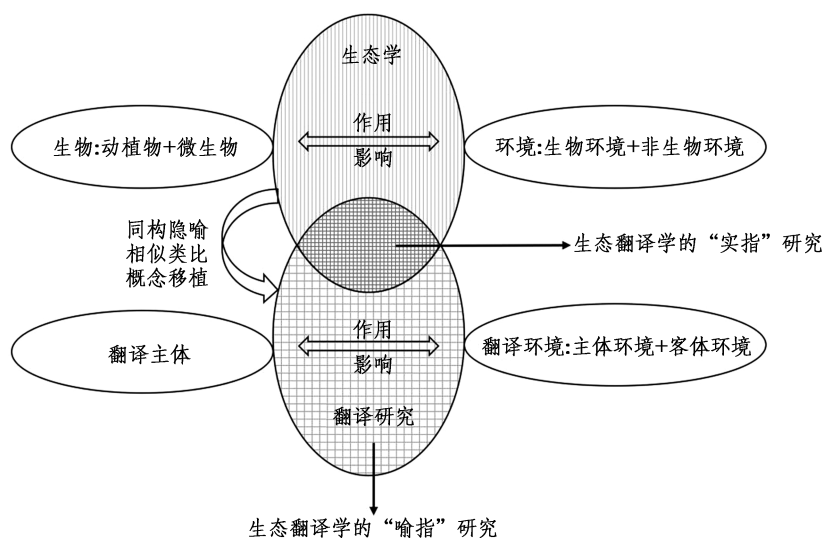


图1 生态翻译学“实指”研究和“喻指”研究定位

由图1所示,生态翻译学的“喻指”研究(图1底部大方格区域)主要通过生态学和翻译研究的同构隐喻对翻译主体与翻译环境的关系问题进行阐释,其环境仅限于与翻译活动相关的主客环境系统,并未涉及自然环境;“实指”研究则体现翻译环境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的交叉互动(图1中部小方格区域)。“喻指”研究更多是丰富翻译研究的叙事角度和书写方式/理论话语和表达方式,拓展或加深对翻译现象的认识,在方法论上也会有所启示;“实指”研究则通过引入生态视野、生态责任和生态理想,拓展翻译研究的研究版图、目的和功能,凸显翻译学作为人文社科中的一员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社会功用和责任担当。

2.3.2 知识创新性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内容涵盖了宏观译学研究(翻译生态体系)、中观译论研究(翻译本体研究)和微观译本研究(生态翻译例释),更多为“喻指”层面的研究,即借鉴生态学的相关术语、概念、理论和方法对译学系统、翻译本体以及翻译策略方法等进行重新阐释。当中也不乏对传统翻译研究的某些认识进行深化与革新的内容,但也存在一些较为空泛、缺乏知识创新的内容。比如中观译论中的“翻译的三维转换——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在实质上和一般翻译研究所阐述的语言层面、文化层面、交际层面的翻译策略相差不大,并没有在实质上拓展翻译学界的认知。理论创新不能仅满足于话语的创新,话语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创新才是根本。就生态翻译学的中观译论,可以结合其当下的“实指”取向,在发掘具有生态意识的翻译行为和生态内涵的翻译文本或揭露和批判反生态的翻译文本或行为等方面,对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等进行理论创新。

2.4 追问研究价值

进行跨学科研究时,对研究价值的追问可从两方面入手:目标针对性和现实关照性,从而回答“跨为何”的问题。目标针对性是指跨学科研究无法涵盖所有研究领域及层次,也无法解决学科领域的全部问题,必须要有明晰的研究目标指向。没有普适所有问题域的理论,过于侧重理论的宏大框架可能会影响其最终解释力。目标针对性有助于在明确跨学科研究目标的基础上,预判相关问题,制定针对性强、可行性高的解决方案,更好地实现跨学科研究的价值。

在现实关照性方面,翻译学跨学科研究要结合特定的社会背景,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体现理论体系的现实关照性。当学科体系建构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如何丰富学科的内涵、发挥翻译学的社会功能应该成为学科理论研究者重点思考的内容(蓝红军,2018b)。生态翻译学发展至今日益重视理论体系的社会功能,如发掘和揭示翻译文本和活动中的生态理性和生态意义,为人类生态文明进步而“译有所为”(胡庚申,2019);适应“绿色发展”、选择“绿色翻译”(胡庚申等,2020)。然而,整体看来,当下生态翻译学的理论之“实”尚未达到其理论之“名”的目标追求,对于如何实现翻译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连通,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相关阐述和研究还非常缺乏。生态翻译学若要成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弥合剂,更多要落脚到生态的“实指”层面,体现其现实关照性,如关照“绿色翻译”在文本数量现实、生态翻译文本创作动力上的现实、自然生态环境与翻译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现实等。

从石诗、陈有坤(2019)对2008—2018年国内生态翻译学相关文献的统计分析看来,生态翻译学相关的应用研究整体更偏向喻指研究。不少应用研究仅仅停留在用翻译案例去“套”生态翻译学相关理论,从而论证该理论的解释力,然而对更新翻译认识或解决新的翻译问题贡献不大。虽然有关生态翻译学的文献层出不穷,但真正对生态翻译理论有所建树的并不常见(石诗等,2019)。当前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建设,翻译实践可以发挥实际作用,生态翻译学的应用研究可在这一方面挖掘更多可能性,体现其现实关照性。基于生态翻译实践发现实际问题,也可对翻译理论贡献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视角。比如,可以通过生态翻译实践译介国外生态建设的经验与做法,讲述中国在生态建设中对人类所做的贡献;也可以通过选择、翻译和传播蕴含生态要素的文本,发掘和揭示翻译活动的生态理性和生态意义。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生态翻译研究的价值目标,而非仅仅停留在理论话语的创建上。

3 结语

本文结合当下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现状,以生态翻译学为例,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路径和要求,包括立足研究起点——问题导向性和学科本体性、明确交融前提——内在关联性和对象适切性、寻求贯通机制——关系明晰性和知识创新性、追问研究价值——目标针对性和现实关照性,从而分别回答跨学科研究“为何跨”“何能跨”“如何跨”和“跨为何”的问题。对生态翻译学而言,若能在上述几个方面有所完善,则能更好地促进翻译研究向新的领域纵深发展,推动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阐释,进一步凸显翻译在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价值,体现翻译学作为人文社科的一员在全球生态危机下的责任担当,提升翻译学的学科地位。

总体而言,翻译学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有了理论创新的意识和动力还不够,还需要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遵循严谨的跨学科路径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推动学科发展。翻译学自带的跨学科性是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在努力跨越“学科围墙”局限的同时,若不明确研究问题和对象、缺乏针对性目标地去建构框架或者话语体系,然后不经思索地广泛套用,用不同的翻译文本去“证明”理论的有效性,这无异于“捧杀”。翻译学跨学科研究要注意立足问题、清晰定位、明确关联、创新知识、凸显价值等要求,才能在学科互动中促进理论健康发展,推动翻译学迈向新台阶。

参考文献:

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包庆德. 2004. 生态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评析[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69-73.
- 陈月红. 2016. 生态翻译学“实指”何在? [J]. 外国语文(6): 62-68.
- 方梦之. 2017. 翻译大国需有自创的译学话语体系[J]. 中国外语(5): 93-100.
- 顾海良. 2010. “斯诺命题”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6): 10-15.
- 韩子满. 2018. 跨学科翻译研究: 优劣与得失[J]. 外语教学(6): 74-79.
- 胡庚申. 2019. 刍议“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 125-131+160.
- 胡庚申. 2014. 对生态翻译学几个问题“商榷”的回应与建议[J]. 中国翻译(6): 86-89.
- 胡庚申. 2017. 若干生态翻译学视角的应用翻译研究[J]. 上海翻译(5): 1-6+95.
- 胡庚申. 2013.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胡庚申. 2010. 翻译生态 VS 自然生态: 关联性、类似性、同构性[J]. 上海翻译(4): 1-5.
- 胡庚申. 2009. 生态翻译学: 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J]. 上海翻译(2): 3-8.
- 胡庚申. 2008. 生态翻译学解读[J]. 中国翻译(6): 11-15+92.
- 胡庚申, 罗迪江, 李素文. 2020. 适应“绿色发展”选择“绿色翻译”——兼谈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应翻译专业设置[J]. 上海翻译(4): 46-51+95.
- 胡志红. 2005. 西方生态批评研究[D]. 成都: 四川大学.
- 蓝红军, 许钧. 201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J]. 中国外语(6): 4-9+15.
- 蓝红军. 2019. 译学方法论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蓝红军. 2018a. 面向问题的翻译理论研究[J]. 上海翻译(3): 1-6+94.
- 蓝红军. 2018b. 从学科自觉到理论建构: 中国译学理论研究(1987-2017)[J]. 中国翻译(1): 7-16+127.
- 李运兴. 1999. 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J]. 外国语(1): 55-61.
- 刘立夫. 2007. “天人合一”不能归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J]. 哲学研究(2): 67-71+127.
- 刘啸霆. 2006. 当代跨学科性科学研究的“式”与“法”[N]. 光明日报, 2006-03-28(12).
- 罗迪江, 胡庚申. 2017. 关于生态翻译学相关问题的再思考——对尹穗琼商榷文章的回应[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3): 63-68+81.
- 石诗, 陈有坤. 2019. 基于 CiteSpace 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可视化分析[J]. 湖北工业大学学报(6): 58-62.
- 唐磊. 2011. 理解跨学科研究: 从概念到进路[J]. 国外社会科学(3): 89-98.
- 王晓玲, 张德祥. 2020. 试论学科知识生产的三种模式[J]. 复旦教育论坛(2): 12-17.
- 吴文梅. 2020. 修“名”与督“实”: 国内翻译学跨学科研究路线图[J]. 上海翻译(3): 18-22.
- 张小丽. 2017. 推类思维视角下的生态翻译学诠释[J]. 外国语文(2): 112-116.
- 赵佳花. 2018. 逻辑学视域下的类比推理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MU Lei YANG Y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chievements and limits of contemporary interdisciplinary TS research. Taking Eco-Translatology as an example, with four basic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in interdisciplinary TS research, namely, “for what reasons”, “on what premises”, “in what ways” and “for what purposes”, the paper proposes four basic approaches and corresponding requirements of interdisciplinary TS research: (a) To ascertain research rationale (question-orientation and TS standpoint); (b) To elucidate research premises (logical relevance and object appropriateness); (c) To explore interdisciplinary mechanisms (clarity of relationship and innovation of knowledge); (d) To inquire into research significance (target pertinence and reality concern).

Key words: interdisciplinary TS research; Eco-Translatology; approaches

责任编辑: 陈宁